

本文收於施仲謀、何志恆主編：《中國語文教學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9年5月，頁205-226。版權屬於香港教育大學，蒙允許轉載於樹仁大學的網頁。

析論理雅各《中國經典》對香港語言文化教育的意義

梁鑑洪

中文摘要

理雅各(James Legge)巨著《中國經典》，本文按其英文名稱使用《中國經典譯注》，是英語世界漢學經典之作，研究中國文化者不可忽視其價值。這巨著的體裁是兩文三語的典範，它有經典的原文、每段原文之後有英文譯文、每段原文都有注解。至於三語則體現於由粵音到官話標音方式的演變，反映西教士對粵語與普通話地位的前瞻。選擇《中國經典譯注》的英譯片段作英文教材，有助提升學生英語水平。同時，有些英譯片段也是英語朗誦的良好題材。各卷的學術性〈前言〉討論了與該經典相關的不同的題目，有助理解中國經學歷史文化。理雅各的譯文與注解，有不少段落受到他的文化背境影響，所以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好途徑，大學一些學科可以把此套經典列入參考文獻。

重要詞彙

兩文三語 教育 《中國經典》 《論語》 《孟子》

Abstract

A 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James Legge's *CHINESE CLASSICS* for Hong Kong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James masterpiec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is still very significant among English Sinology. Those who research on Chinese Culture cannot neglect its value. The format is a good sample of biliterate and trilingual because it is a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 with commentaries. The change of the pronunciation from Cantonese of the early version to Mandarin of the later version shows the trilingual knowledge. Some selected passages are good teaching materials. The five academic introductions briefly introduce the Chinese Classics history. Becaus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ffected Legge'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ies, *The Chinese Classics* made culture exchange. These classics can be included in reference documents of some related subjects.

key words

biliterate and trilingual education *Chinese Classics* Confucian Analects Mencius

緒論

理雅各 (James Legge)，1815 年 12 月 20 日出生於蘇格蘭亞伯丁郡的漢德利城 (Huntly) ([美]吉瑞德著，2011，頁 2)。1837 年進入聖公會的海伯雷神學院 (Highbury Theological College) 學習，接受了兩年神學訓練，被倫敦傳道差會派往馬六甲作傳教士，他與太太二人於 1838 年到達馬六甲，協助「英華書院」的教育工作，並且開始學習中文([美]吉瑞德著，2011，頁 17)。由此認識到把中國的《四書》、《五經》翻譯成英文的重要性。

1843 年，理雅各奉命把英華書院遷到香港([英]海倫·藹蒂絲·理著，2011，頁 509)。自此之後，就根據上述信念開始研究和英譯中國古代經典的工作。

《中國經典》初版分五卷，第一卷是《四書》上卷包括《論語》、《大學》、《中庸》，第二卷《四書》下卷《孟子》，同於 1861 年出版，第三卷是《書經》附《竹書紀年》於 1865 年出版，第四卷《詩經》於 1871 年出版，第五卷《春秋》與《左傳》於 1872 年出版。這套《中國經典》版本全是中英雙語對照本，有詳細的緒論和注釋。《中國經典》的英文全名是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所以本人使用了《中國經典譯注》的名稱。

理雅各《中國經典譯注》的《四書》曾經修訂出版，第一卷名為《孔子生平與思想》(*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Confucius*)，於 1867 年出版，包括《論語》、《大學》、《中庸》的英譯本。第二卷名《孟子生平與著作》(*The Life and Works of Mencius*)，於 1875 年出版。這版本同樣是有詳盡的緒論和注釋，是英語本，沒有中文字。

理雅各於 1873 回到英國，再將 1861 年出的《四書》修訂出版，第一卷於 1893 年出版，包括《論語》、《大學》、《中庸》。第二卷是《孟子》，於 1895 年出版。這版本同樣是中英語本，有詳盡的緒論及注解。這個版本的《四書》是對 1861 年版作出修訂和補充，補充了一些參考文獻，修訂了一些錯誤。而最大的特色，是對一些中文字的標音方式改變，1861 年版的《四書》使用了粵音的標音方式，而由 1893 年至 1895 年的《四書》，轉用了官話的標音方式。

現在由臺灣南天書室出版的《中國經典》將《四書》合為一冊變成四大冊一套。

這套翻譯成為外國學生學習中國文化的範本，可供那些需要了解中國哲學、宗教道德的讀者閱讀([美]吉瑞德著，2011，頁 27-28)。《中國經典譯注》，是英語世界漢學經典之作。但中國人以至香港人，都不可忽視其價值。本文的目的是討論這套經典對香港人以至華人在語言文化上的意義。

本文分五個角度探討這問題，第一，這套《中國經典譯注》是兩文三語的典範；第二，這套經典是英語學習的教材；第三，此套經典是理解中國古文化的途徑；第四，此經典也可以是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材料；第五，此經典應用於香港教育的可行性。

一、 兩文三語的典範

兩文三語是政府所提倡的教育政策與目標，當然也是實際需要，手懂得寫

中文與英文，口可以講英語、粵語與普通話，可以說是很實際的需要。英語是國際語言，香港人懂得寫英文與講英語是必需。而香港人本身是中國文化的一份子，懂得寫中文是天經地義之事，《中國經典譯注》的體裁是兩文三語的典範。每一本經典的翻譯，正文的體裁是經典的原文、每段原文之後有英文譯文、每段原文都有注解(參附錄的書影一至六)，是兩文的典範。

這種中文原文與英文翻譯對照，然後加以注解的形式，不是理雅各獨創，馬士曼(Marshman)《論語譯注》(*The Works of Confucius*) (參附錄書影七)經已使用這種中英對照並加注解的形式。理雅各將這形式優化了，排版比較講究。

香港的教育，強調兩文，就是中文與英文，讀中國的經典當然對我們的文學語言修養大有好處。如果在大學中文系的課程之中，加上中國經典的英譯的科目，在修讀中國經典的同時，也可以操練英文與英語，可以成為一個中英雙語並重的科目。

至於三語則體現於多音字由粵音到官話標音方式的演變，理雅各《孟子譯注》1861年版使用粵語標音方式，但《孟子譯注》1895年版卻使用了官話，現在稱為普通話的標音方式，反映西教士對粵語及普通話地位的前瞻。現在只引述三個字說明其轉變。

(一)、「父」字讀音

《梁惠王下》第五章第五節：「古公亶父」(《孟子注疏》，1981，頁36)。

理雅各《孟子譯注》1861年版云：「the ninth in descent from Kung Lew, by name T'an-foo (up 2nd tone)」(Legge James, 1861, p.39.)

「父」字粵音有陰上聲，音與「苦」同，古代對男子的美稱，也可表示老年人(何文滙，2001，頁326)。另又有陽去聲，音與「付」同，讀如「祖父」之父(何文滙，2001，頁327)。陸德明《經典釋文》云：「父，音甫」(陸德明，1985，上冊，頁350)。理雅各取了粵音的陰上聲，音「府」。

理雅各《孟子譯注》1895年版云：the ninth in descent from Kung Liû, by name Tan-fû (in 3rd tone)。(James Legge, 2001b, p.163-164.)

理氏在此取了普通話第3聲。根據《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父」字有fǔ、fù二個讀音，理雅各取了fǔ這個音，是對男子的美稱。(《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2002，頁642)。

(二)、「積」字讀音

《梁惠王下》第五章第四節云：「《詩》云：『乃積乃倉』。」(《孟子注疏》，1981年，頁35)。

理雅各《孟子》英譯本注1861年版云：「積,read ts'ze up. 3rd tone, "to store up," "stores".」(Legge James, 1861, p.39.)

根據《廣韻》「積」有去聲與入聲兩音，去聲「子智切」(《廣韻》，1986，

頁 346)。入聲「資昔切」(《廣韻》，1986，頁 516)。理雅各取了粵音的陰去聲。

理雅各《孟子》英譯本 1895 年版注云：「積,read ts'ze in 4th tone, "to store up," "stores."」(James Legge, 2001b, p.162-163.)

理氏在此取了普通話的第 4 聲，根據《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積字有第 1 聲「jī」、第 4 聲「zì」兩個讀音。第 4 聲是積蓄之意(《康熙字典》，2002，頁 820)。

(三)、「迎」字的讀音

《孟子·告子下》第一章第三節：「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孟子注疏》，1981 年，頁 209)。

理雅各《孟子》英譯本 1861 年版：「親迎 (lower 3rd tone) .」(Legge James, 1861, p.298.)

「迎」粵音有二音，一是讀陽平聲「語京切」，讀音與「營」相同(何文滙，2001，頁 206)。另一音是陽去聲「魚敬切」，讀與「認」同音(何文滙，2001，頁 207)。孫奭：「親迎，張餘慶切，下同。」(孫奭，1969，頁 20392)。朱熹：「迎，去聲。」(朱熹，1985，卷 12 頁 1)。都是，讀「認」音。理氏選取了粵音的陽去聲，讀「認」音。

理雅各《孟子》英譯本 1895 年版注：「親迎 (4th tone) .」(James Legge, 2001b, p.422.)

根據《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迎」字有第 2 聲 yíng、第 4 聲 yìng 兩個讀音。「《正韻》：『凡物來而接之則平聲，物未來而往迓之則去聲。』」(《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2002，頁 1237)。

理雅各於 1843 年抵達香港，到 1861 年出版《四書》，大部份時間都是在香港做基督教的傳教工作，對着以粵語為主的香港人或廣東人，以粵語溝通是正常之事，使用粵音作標音方式是順理成章。理氏對粵音與普通話的讀音一絲不苟，對兩文三語都精益求精，值得香港每個學生借鏡。

理氏用了威妥瑪漢字注音方法([美]吉瑞德著，2011，頁 360)，用中文而言理氏用當時稱為官話的讀音，後來發展成普通話。這些西教士分佈在中國大地做傳道工作，他們觀察到未來趨勢，官話即普通話的前身，會成為中國的主要語言，可見得他們有先見之明。

二、 英語學習的教材

理雅各《中國經典譯注》英譯本的英文水平是無容置疑的，例如《論語》英譯本在翻譯學上成為經典的範式(理雅各英譯、林宏濤譯註，2015，頁 005)。所以，選擇此譯注的英譯片段作英文教材，有助提升學生英語水平。同時，有些英譯片段也是英語朗誦的良好材料。例如《論語》、《孟子》等。

現時的中學文憑試課程，選取了十六則《論語》章節作為教材，其中論仁有四則，論孝有四則，論君子有八則，又選取了《孟子》的〈魚我所欲也章〉。茲引《論語》論仁、孝、君子各一則及《孟子》〈魚我所欲也章〉為例，並引用理雅各英譯作一對照。

(一)、《論語·里仁》第二章論仁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論語注疏》，1981，頁36)。

The Master said, "Those who are without virtue cannot abide long either in a condition of poverty and hardship, or in a condition of enjoyment. The virtuous rest in virtue; the wise desire virtue."

(James Legge, 2001a, p.165.)

(二)、《論語·里仁》第五章論君子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論語注疏》，1981，頁36)。

The Master said, "Riches and honors are what men desire. If it cannot be obtained in the proper way, they should not be held. Poverty and meanness are what men dislike. If it cannot be avoided in the proper way, they should not be avoided. If a superior man abandon virtue, how can he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at name? The superior man does not, even for the space of a single meal, act contrary to virtue. In moments of haste, he cleaves to it. In seasons of danger, he cleaves to it."

(James Legge, 2001a, p.166.)

(三)、《論語·為政》第七章論孝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論語注疏》，1981，頁17)。

Zi You asked what filial piety was. The Master said, "The filial piety nowadays means the support of one's parents. But dogs and horses likewise are able to do something in the way of support; - without reverence, what is there to

distinguish the one support given from the other?"

(James Legge, 2001a, p.148.)

(四)、《孟子·告子上》第十章〈魚我所欲也〉章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孟子注疏》，1981，頁201-202)。

Mencius said, 'I like fish, and I also like bear's paws. If I cannot have the two together, I will let the fish go, and take the bear's paws. So, I like life, and I also like righteousness. If I cannot keep the two together, I will let life go, and choose righteousness. I like life indeed, but there is that which I like more than life, and therefore, I will not seek to possess it by any improper ways. I dislike death indeed, but there is that which I dislike more than death, and therefore there are occasions when I will not avoid danger. If among the things which man likes there were nothing which he liked more than life, why should he not use every means by which he could preserve it? If among the things which man dislikes there were nothing which he disliked more than death, why should he not do everything by which he could avoid danger? There are cases when men by a certain course might preserve life, and they do not employ it; when by certain things they might avoid danger, and they will not do them. Therefore, men have that which they like more than life, and that which they dislike more than death. They are not men of distinguished talents and virtue only who have this mental nature. All men have it; what belongs to such men is simply that they do not lose it.

(James Legge, 2001b, pp.411-414)

雖然，理氏有誤譯的情況，例如《孟子·梁惠王》上的「明足以察秋毫之末」，理氏譯「秋毫」做「autumn hair」是停留在詞語的表層意義，並不準確理解詞語的實質意義，譯作「tiny hair」比較正確(吳志剛，2009，頁147)。倘若選用其英譯本做英語教材或朗誦材料，選擇者可做好把關工作，詳細審視其譯文是不是與原文相符。這種做法，一方面可以學英語，同時也可藉此深度認識中國的經典，又可藉此知道中國的經典英譯概況，可謂一舉三得。

三、 理解中國經學文化的途徑

各卷的〈前言〉討論了與該經典相關的不同的題目，加上詳盡的英文注解，有助理解中國古代文獻與歷史文化。茲表列其《中國經典譯注》每卷學術性緒論(PROLEGOMENA)的大綱並加以簡述：

(一)、《論語》、《大學》、《中庸》

《中國經典譯注》第一卷《論語》、《大學》、《中庸》，此卷的學術性緒論共分六章(Legge James, 2001a, pp.1-136.)，現將其大綱中譯如下：

第一章、中國經典總論
第一節、《中國經典》名下的典籍
第二節、《中國經典》的權威
第二章、孔子《論語》
第一節、漢代學者與《論語》文本之形成
第二節、《論語》的作者，時代，計劃及其真確性
第三節、《論語》注解述評
第四節、《論語》古字與今字對比舉例
第三章、《大學》
第一節、文本歷史與不同版本的次序
第二節、大學之作者與經典文本及注釋之差異
第三節、《大學》之範圍與價值
第四章、《中庸》
第一節、《中庸》在《禮記》中之位置，作為單行本之刊行歷程
第二節、《中庸》的作者及其行狀
第三節、《中庸》的完整性與真實性
第四節、《中庸》的範圍與價值
第五章、孔子及其第一代弟子
第一節、孔子生平
第二節、孔子的主張及影響
第三節、孔子的第一代弟子
第六章、本卷參考文獻
第一節、中文參考文獻及簡介
第二節、外文參考文獻

理氏在此學術性緒論認為，西漢是中國經典的收集與整理的里程碑，而這些經典是經過劉向、劉歆等人偽造的。《論語》一書，是孔子死後，他的弟子收

集他的語錄而成的。在第二世紀，鄭玄把漢代流通的三個《論語》版本—魯論、齊論、與古論整理合併成為現代通行的版本，並加上注解。〈大學〉原是《禮記》其中一篇文獻，作者是誰則很難決定。理氏受了朱熹的影響，認為〈大學〉稱為〈太學〉更為適合。〈中庸〉也是《禮記》其中一篇文獻，劉歆《七略》已載有《中庸說》二篇，而《隋書·經籍志》載有《禮記中庸傳》、《中庸講疏》、《私記制旨中庸義》，可見《中庸》在宋代之前已經有單篇流行，理氏接納《史記》的講法，〈中庸〉的作者是孔子之孫子思。

關於劉向、劉歆等人偽造經典的問題，錢穆在〈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1983，頁 1-163)有詳盡分析，錢穆認為可能性不大。

(二)、《孟子》

《中國經典譯注》第二卷是《孟子》，此卷的學術緒論共分四章(Legge James, 2001b, pp.1-123.)，茲轉錄並中譯其大綱如下：

第一章、有關《孟子》的著述
第一節、漢代上述著述的認定，以及此前狀況
第二節、趙岐及其《孟子注釋》
第三節、其他注釋
第四節、完整性、作者、以及在古典經籍中的接受情況
第二章、孟子及其門徒
第一節、孟子生平
第二節、孟子的影響與觀點
第三節、孟子的第一代弟子
附錄
1、荀子〈性惡篇〉
2、韓文公〈原性篇〉
第三章、楊朱與墨翟
第一節、揚朱的思想
第二節、墨翟的思想
第四章、本卷參考文獻
第一節、中文參考文獻
第二節、外文參考文獻

理氏的緒論認為，孟子的生平可見諸漢司馬遷《史記》卷七十四，《孟子》一書在西漢韓嬰、董仲舒的作品已有引述。此書是在秦以後很久才被賦予「經典」的地位。東漢趙岐的注解比前人做得詳盡。但由趙岐至宋代的孟子注都消失了。宋代不少《孟子》注解，但以孫奭與朱熹的注解最重要。理氏轉錄了《荀子·性惡篇》、韓愈〈原性篇〉、《列子·楊朱篇》、《墨子·兼愛》上、中、下三篇對比《孟子》的人性論。理氏雖然贊賞孟子的「性善論」，但他認為孟子

的「人性論」是不完全的，因為孟子沒有講「上帝」—基督教教義的上帝，所以把人的能力過份抬高了。

理氏站在基督教立場批評《孟子》的人性論，基督教認為人是上帝所造，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無能力自我提升到完美的境界。這點可說是基督教與中國哲學的最大對立面。

(三)、《書經》附《竹書紀年》

《中國經典譯注》第三卷是《書經》，其學術性緒論共分六章(Legge James, 2011a, pp.1-208.)，轉錄並中譯其大綱如下：

第一章、《書經》的歷史
第一節、秦皇焚書前(公元前 212)；書的名稱；編纂及篇數；文獻來源
第二節、秦皇焚書(公元前 212)至朱熹(公元 1130)；伏生《今文尚書》被發現；孔安國《古文尚書》第二部份被發現；孔安國《古文尚書》地位被承認
第三節、朱熹至當代；對被接受的孔安國《古文尚書》的經與注作奇怪的懷疑
第二章、《書經》紀錄的可信性
第一、二卷(唐書、虞書)有些傳說故事比第三至五卷(夏書、商書、周書)可信度較低；堯、舜、禹三者，禹是中華帝國的建立者，他建立了治水、定經界的偉大工作程。
第三章、《書經》重要年代的確定
《書經》沒有年代表，直至漢代中國人才參照通用的年份整理古代史，堯舜的三代時期，由公元前 2000 年開始。
附錄、中國古代天文學
第四章、中英對照《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的發現及流傳；《竹書紀年》轉載；其可信程度；其結尾所載人物與《書經》早期記載相同；古代帝王年表。
第五章、中華古代帝國
中華民族進入中華大地之始，其他初期定居的民族，中華民族之擴展，宗教與迷信，政治制度。
第六章、本卷參考文獻
第一節、中文參考文獻
第二節、外文參考文獻

理氏據毛奇齡的講法，認為秦代焚書之前，《書經》只稱為《書》。《書經》是由孔子對虞、夏、商、周的文獻整理與刪削而成的，由虞書開始到周書。理

氏把《書經》分成唐、虞、夏、商、周五部份，共 58 篇。

理氏的底本是清代學者阮元於嘉慶二十年(1815 年)刊刻的《尚書》，他認這版本就是孔安國傳下來的《古文尚書》。在流傳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輕微的修訂，但無損全書的真確性。

這是理雅各譯注尚書的最重要觀點，因為清代的學者對《尚書》的看法，主流意見認為，這個 58 篇版本的《尚書》是「偽《古文尚書》」，但理氏不接納這個講法，這是理氏譯注《尚書》最特別之處。

(四)、《詩經》

《中國經典譯注》第四卷是《詩經》，其學術性緒論共分六章(Legge James, 2000, pp.1-182.)，現轉錄並中譯其大綱如下：

第一章、《詩經》早期歷史及其現代文本
第一節、孔子之前的《詩經》與孔子編纂《詩經》
第二節、自孔子到現今《詩經》文本的形成
附錄、《詩經》之外的古代詩歌舉例
第二章、詩歌的來源與結集，詩歌的解說及作者，詩序及其權威
附錄
一、〈詩大序〉及〈詩小序〉
二、詩經年表
三、韓嬰《韓詩外傳》
第三章：《詩經》的韻律；古字的讀音；《詩經》的詩歌價值
第一節、《詩經》的韻律
第二節、韻腳與古字的讀音，韻腳的分部
第三節、《詩經》的詩歌價值，其詩歌藝術的獨特性
附錄、中國古代詩歌的各種格式
第四章、《詩經》裏面的中國，國家的邊界範圍，諸侯國，宗教，社會狀況
附錄、根據《詩經》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狀況
第五章、本卷參考文獻
第一節、中文文獻
第二節、外文文獻

理氏認為司馬遷謂孔子把三千多篇詩刪削成為 305 篇是不可信的，但孔子整理過《詩經》卻是事實。自孔子死後至秦代，《詩經》已常被引用，例如《孟子》已經引用過不少詩歌。漢代有齊、魯、韓三家《詩經》學派，但後來消失了，只有毛詩一派流傳下來。

理氏選錄了《古詩源》43首漢代以前的古詩，是沒有收在《詩經》裏的，藉此與《詩經》的詩作一對比。又把《詩經》的〈大序〉與〈小序〉都轉錄於〈緒論〉，這種做法顯示他對《詩經》的整體理解是受到朱熹《詩集傳》的影響。理氏又把《詩經》三百多首詩編年，也轉錄了《韓詩外傳》16段文字，供讀者跟毛詩比較。

理氏也是站在基督教立場研究《詩經》，例如他認為《詩經》的「上帝」就是基督教所信的「超越的上帝」。《詩經》的上帝就是希伯來文的「Elohim」，也就是希臘文的「Theos」，與英文「God」同義。

(五)、《春秋》及《左傳》

《中國經典譯注》第五卷是《春秋》及《左傳》，其學術緒論共四分章 (Legge James, 2011b, .1-147.)，現轉錄並中譯其大綱如下：

第一章、《春秋》的性質及其價值
第一節、《春秋》最早之記錄引致期待之落空。
第二節、《春秋》之來源及特性—孔子容許自己之權威在增補筆削之時發揮自由嗎？
第三節、漢代《春秋》之發現—這確係孔子之《春秋》嗎？
第四節、《春秋》的三個早期注本
第五節、《春秋》之價值。
附錄
第一節、《公羊傳》、《穀梁傳》例證
袁枚質疑《春秋》是孔子所作之信件—〈答葉書山庶子〉
第二章、《春秋》年表
第一節、文本年表—附整個時期日食及陰曆月份表格。
第二節、《左傳》中的日期。
第三節、周朝天子及各封邑諸侯名錄。
第三章、《春秋》時期的中國
國界的範圍，諸侯國反叛頻頻，強大諸侯的形成與擴展，環伺四週的外族。
第四章、本卷主要參考文獻
第一節、中文參考文獻
第二節、外文參考文獻。

理氏認為孟《孟子》所載謂《春秋》是孔子所作，這講法是正確的。《春秋》二字其實是指編年，古代史家記歷史，需要按年、季、月、日紀載史事。孔子除了使用魯史編《春秋》之後，也吩咐弟子們從各處搜集周代歷史，供孔

子編纂《春秋》。但是到了漢代，《春秋》卻是被人從《春秋》三傳：《公羊》、《穀梁》及《左傳》的經文編成之，理氏引用馬端臨《文獻通考》證明此說。《春秋》這本經書，有三個注本，《公羊》、《穀梁》、《左傳》，《左傳》的作者是左丘明，據說是孔子的學生，也是魯國史官，但事實上，左氏的身份很難確定。《左傳》一書是漢代才被人發覺的。《左傳》的作用是把一些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弄清，但《左傳》也有經過漢代及晉代的學者修訂了一些內容。《春秋左傳》對後世的歷史著作有很大影響，有以《春秋》為名者如《呂氏春秋》、《楚漢春秋》，也有用其體例寫歷史的如《資治通鑑》。

總括而言，理雅各五篇學術緒論，對各卷經典作歷史性的考察，對經典的歷史源流都作出探討，可以說是中國經學歷史的研究，是具有相當高水平的學術性緒論，頗有參考價值。

至於理氏認為不少中國經典都經過修改，類似的問題，有些中國近代的學者也作過研究，至於真相如何，尚待日後研究證實。但是，在真偽問題上最富爭議性的「偽《古文尚書》」，他卻認為是真的《古文尚書》。

四、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材料

理雅各的譯文與注解，有不少段落受到他的文化背境影響，所以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好途徑。本文限於篇幅，只能討論天文與宗教兩點。

(一)、中西天文學的交流

《書經·舜典》云：「以齊七政」。(《尚書正義》，1981，頁35)。

理氏英譯：「that he might regulate the seven Directors」。(Legge James, 2011a, p.33.)

孔安國云：「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尚書正義》，1981，頁35)。

理氏跟隨了孔安國注解云：

By these 七政,..... "The consent of later times is all but universal to the view of Gan-kwō, that the seven governments were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five planets, Mercury, Venus, Mars, Jupiter, and Saturn, each of which had its own rules of government."

(Legge James, 2011a, p.33.)

七政者，太陽(the sun)、月亮(the moon)、水星(Mercury)、金星(Venus)、Marse(火星)，木星(Jupiter)，土星(Saturn)。中國古代人相信日月五星影響人間政事，每星管理一種政事。(屈萬里，2014，頁17)。理雅各的解釋，可以說是中西天文學的交流，一是五星名字的對照，二是向西方展示中國古代天文與政事的關係。可說是中西天文學的交流。

(二)、中西宗教思想交流

《書經·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尚書正義》，1981，頁 35-36)。帝堯促使舜攝帝位，舜攝位後乃祭祀上帝及四時寒暑，及名山大川的神祇。孔安國云：「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宮，天之最尊者。』」(《尚書正義》，1981，頁 35-36)。

上帝這一信仰觀念，在中國古代是相當普遍的，王肅認為祭上帝就是祭天，而馬融則認為上帝是最高的太一神，已經反映了不同時代對上帝有不一樣的理解。理雅各翻譯與注解卻把《書經》的「上帝」解作基督教的上帝。

理氏英譯上帝作「God」(Legge James, 2011a, p.34.)，而他的注解把《書經》的「上帝」解作基督教的上帝云：「By 上帝 we are to understand God, the supreme Ruler.」(Legge James, 2011a, p.34.)，理雅各將「上帝」譯做「God」認為是最高主宰。他是倫敦傳道會差派來中國傳教的宣教士，對基督教的教義了解應有相當程度，在英文《聖經》King James Version(英王雅各欽定本)或其他版本的英文《聖經》，「God」都是指至高的上帝，亦即是基督教所信的「上帝」，而「god」則指其他神靈。

理氏把《書經》的上帝等同了基督教的上帝。理氏這種翻譯與理解，在中國人以至西方基督教人士都有所保留。但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論，他是做了中西宗教文化交流的工作。

儘管他的翻譯因理解問題出現瑕疵，但他在翻譯史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殺的，他對中國傳統典籍翻譯所做出的貢獻也是不容忽視的。鑒於中國傳統典籍翻譯工作的特殊性與複雜性，翻譯工作者對中國傳統典籍要採取嚴謹的態度，認真研究、準確理解、正確表述，為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做出貢獻，讓更多歷史悠久的傳統典籍走向世界(吳志剛，2009，頁 147)。

五、《中國經典譯注》應用於香港教育的可行性

香港育強調兩文三言，兩文是中文與英文，屬於書寫性質的；三語是指普通話、粵語、英語，是口語性質的。1861 年至 1871 年初版與 1893 年後陸續再版的《中國經典譯注》俱是中英雙語對照本，在兩文的意義上是顯而易見。

臺灣商周出版社出版的《讀論語學英語》就是採用了理雅各的英譯本，由林宏作中文注解，此書強調中英並重學習《論語》，其〈前言〉云：

在英譯方面，則加以字詞解釋並討論翻譯的問題：讀者從英文翻譯回頭來理解《論語》，會有另闢蹊徑的感覺。例如說，「仁」在《論語》裡有許多不同的意義，而無論注解或語譯都很少突顯這點：在英譯裡，我們可以看到「仁」有 benevolence (慈愛)、perfect virtue (完美的德性)、the virtue proper to humanity (人類特有的德性)、true virtue (真正的德性) 等不

同的譯名，方便我們了解孔子在不同情境裡所談的仁。

([英]理雅各譯，林宏濤譯注，2015，頁 005)。

故此，筆者大膽建議一些可行的途徑將《中國經典譯注》應用於香港教育。

首先可在大學中試行。在大學一些科目如：《論語》、《孟子》、《四書》、《詩經》、《書經》、《左傳》、《中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英翻譯》等科目，把《中國經典譯注》列作參考書目，甚至以之作課本。使修讀該等科目的學生知道，西方人對中國的經典研究成果是不容忽視的，授課老師可多鼓勵學生跳出中國經典只需要用中文閱讀及研究的框框，擴闊學生的語文視野。

鼓勵學生研究《中國經典譯注》，以之作為畢業論文的研究材料。例如做理氏《論語譯注》兩個版本的多音字讀音比較，藉理氏對粵音與普通話的讀音一些不苟的處理態度，促使學生反省讀正音的態度，並藉著研究那些由粵語變成官話讀音的文字，以及英文翻譯與中文原文是否相對應，英文翻譯是否準確等，激勵學生對兩文三語加深理解。也可以根據理雅各這套巨著，研究一些中西文化交流的題目，從《詩經》與《書經》便可以研究《中國與基督教的上帝觀比較》，從《論語》「君子不器」的譯注，已可以研究《中西哲學的人觀》，理氏對《孟子》的「性善」論作出了不少批評，可資研究《中西文化的人性論》。

至於中學教育方面，可以選取《中國經典譯注》一些片段，以中英對照的方式，供學生作指定閱讀材料，也可選擇一些片段，作為英文科的教材。讓學生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

結論

理雅各(James Legge)巨著 *CHINESE CLASSICS*，學術界通常稱為《中國經典》，但本文認為稱《中國經典譯注》較適合，第 1 卷《論語、大學、中庸》，第 2 卷《孟子》先後於 1861 年出版，第 3 卷《詩經》附《竹書紀年》於 1865 年出版，第 4 卷《詩經》於 1871 年出版，第五卷《春秋》與《左傳》於 1872 年出版。這套《中國經典譯注》是中英雙語版，有詳盡的學術性緒論。

《論語》與《孟子》都有作修訂再出版，1867 年出版《孔子生平與思想》，1875 年出版《孟子生平與著作》，兩者都是英文版，有緒論、英文譯文和英文註解。1893 年《論語、大學、中庸》訂修出版，1895 年《孟子》修訂出版，這個版本的格式與 1861 年版相同。

這套《中國經典譯注》可說是是兩文三語的典範，中文與英文兩文對照。而在語音的表達方式，1861 年版的《論語》、《孟子》是粵語，而 1893 年版

《論語》及 1895 年版《孟子》用了官話—普通話的表達方式。體現了兩文三語的意義。《中國經典譯注》可以用作英語教學及朗誦材料，《論語》、《孟子》是很明顯的例子。各卷的學術性緒論，可說是中國經學歷史與文化的簡介。理雅各因其背境關係，使用了西方文化的概念解釋中國的古文獻，例如藉西方的天文學與宗教解釋中國的經典，促使中西文化交流。這套經典可以列在一些大學科目作參考文獻，例如《論語》、《孟子》、《四書》、《詩經》、《書經》、《左傳》、《中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英翻譯》等，也可鼓勵學生以之為論文研究的題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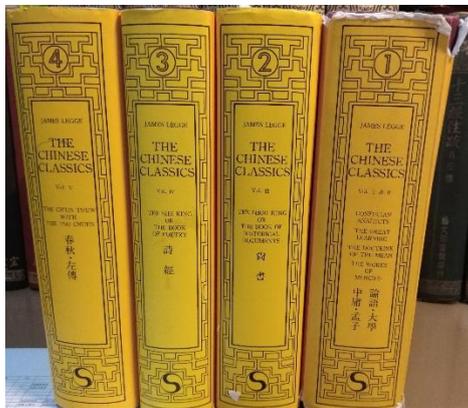
參考文獻

1. [美]吉瑞德著，段懷清、周俐玲譯(2011)《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 [宋]朱熹(1985)《四書集註·孟子集註》，成都：巴蜀書店，影印怡府藏板。
3. 何文滙(2011)《粵音正讀字彙》，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
4. 《孟子注疏》(1981)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版。
5. 吳志剛(2009)《準確理解原作是典籍英譯的關鍵—理雅各英譯〈孟子〉指瑕》，《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第 5 期。
6. 《尚書正義》(1981)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版。
7. 屈萬里(2014)《尚書集釋》，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8. [宋]孫奭(1969)《孟子音義》，臺灣：大通書局影印[清]徐乾學輯：《通志堂經解》本，同治十二年粵東書局刊本，第卅五冊。
9. [英]海倫·藹蒂絲·理著，段懷清、周俐玲譯(2011)《理雅各：傳教士與學者》，[美]吉瑞德著，段懷清、周俐玲譯：《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本。
10. [唐]陸德明(1985)《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1. [英]理雅各譯，林宏濤譯注(2015)：《讀論語學英語—論語中英文譯注讀本》，臺灣：商周出版。
12. 《康熙字典》(2002)標點整理本，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3. 《論語注疏》(1981)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版。
14. 錢穆(1983)《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臺灣：東大圖書公司。
15. Legge James. (1861). *The Work of Mencius vol. 1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Hong Kong: The Authors.
16. Legge James. (2000). *The She King, Vol. 3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Tai Wan: SMC Publishing Inc.

17. Legge James. (2001a).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Vol. 1.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Tai Wan: SMC Publishing Inc.
18. Legge James. (2001b). *The Work of Mencius*, vol. 1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Tai Wan: SMC Publishing Inc.
19. Legge James. (2011a). *The Shoo King*, vol. 2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Tai Wan: SMC Publishing Inc.
20. Legge James. (2011b). *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vol. 4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Tai Wan: SMC Publishing Inc.
21. Marshman Joshua.(1809). *The Works of Confucius*. Serampore: Mission Press.

附錄、理雅各《中國經典》書影

一、《中國經典》



二、《論語》



三、《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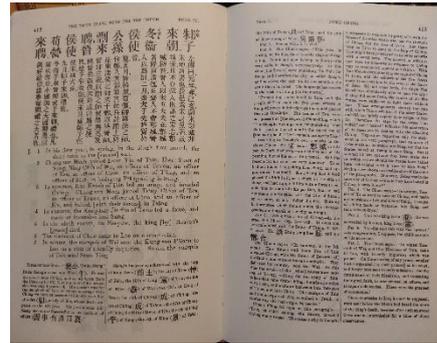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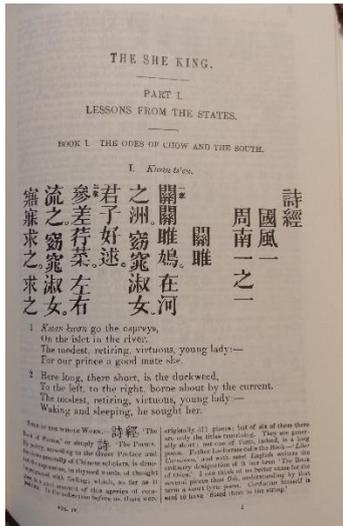


四、《書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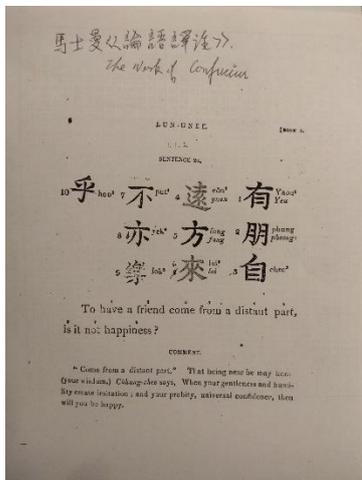


五、《詩經》

六、《春秋》與《左傳》



七、馬士曼《論語》英譯本書影



作者個人資料

梁鑑洪

香港樹仁大學兼任講師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

電話 94146532

hkgerson2013@gmail.com